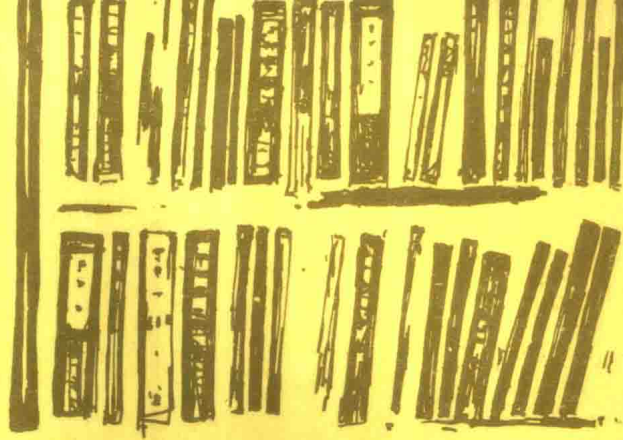


刘喜申 编著



家庭藏书指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家庭藏书指南

刘喜申 编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庭藏书指南/刘喜申编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5.9

ISBN 7-5074-0757-8.

I. 家… II. 刘… III. 家庭-图书典藏-基本知识 IV. G
25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827 号

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35833 传真:64214573

责任编辑:王宪法 责任校对:胡志江

封面设计:仝开健 责任印制:张建军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50 千字 印数:5001—9000 册

定价:7.60 元

一、古今藏书漫话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人们熟知的一首诗《观书有感》。作者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人之心灵澄明、思路明畅、从容自得，象如镜池水。一个人的学问知识所以丰富，是因为有深厚的渊源，能不断从书籍中获得新的思想。朱熹说过：“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对书有极高的评价：“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唯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爱书是中华民族传统之美德。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说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人创造了书，书也造就了人。无数饱学之士从书中吸取智慧，吸取营养，为各个时代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华民族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辉煌，古代优秀文化的绵延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据《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记载，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到今天已快4000年了。而据《史记·夏本纪》，已有4200

年。特别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起,每一年都有可靠的文字记载,这在世界各国中极为罕见。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足以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今天,中国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图书大国。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的过去,也创造着光辉的今天和未来。

今天,看书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可以从书店买书,从图书馆借书,不少人家庭还拥有许多藏书——也可以叫作家庭图书馆。然而在古代,看书和藏书不仅对大多数人,就是对少数有权势者来说也是不容易的。其困难程度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一)书籍形式及其演变

1. 从简册到卷子 每个时代有着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消费水平。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不可避免地受着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不仅是精神消费,而且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和创造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

在精神财富中,图书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是为了记忆和传播知识而产生的。在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劳动所得仅能满足最低生活要求,需要记忆和传播的东西很少,还没有产生文字、图书的要求和条件。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分工日益复杂,产生了原

始社会的意识形态，人们也有了娱乐的要求。文化、教育活动的萌芽出现了。要积累传播知识，仅靠口耳相传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人们创造了结绳、刻木记事，接着逐渐发明了文字。我国文字，不是象传说中那样，由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而是从刻划记号和图画文字演变来的。估计在夏代初期形成了文字体系。汉字至今已有 4000 年历史。

据考古发现，早期的文字刻在木石、陶器、甲骨或铸刻在青铜器上。人们熟知的甲骨文或称契文、殷契以及青铜器上的铭文或称金文、钟鼎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图书，只能算是图书的雏形或图书的先驱形式。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可以推测，在西周初年人们开始用竹片作为书写工具。也有人认为，殷商时期简策也可能和甲骨并世。一支竹片叫做“简”。许多支简连在一起称为“策”。简依次排列称为“编”。简策就是竹书。一捆竹书叫一策书，也称一册书。今天说的“卷”也由此而来。“册”在古代，就是把简编连在一起的象形文字。“罄竹难书”的成语透露了书籍和竹子的关系。就是“书籍”的“籍”字，也从“竹”字头。除竹简外，还有木简。简策用织物包起来，包装物叫“帙”；用口袋包装叫“囊”。

和简同时的还有“牍”。一块木板称“版”，写了字的版称“牍”，一尺见方的牍叫“方”。现在印刷业有“版”的术语。

制造竹简的过程是：把竹子截成一定长度的圆筒，劈成宽窄相等的竹签，然后把竹子放在火上烤去水分。有水分的竹签，写字时会渗墨，又容易腐烂、虫蛀和变形。烤去水分的这一步骤称为“杀青”，又叫“汗青”。“汗青”以后成为“史册”的代称。制成竹简，就可以书写了。书写时，除了笔墨，小刀也是必备的。写错了，用小刀刮去。这就有了“刀笔”之说，指办理公文案卷事情。作为书，一般来说是先把简用细绳编连起来再书

写。作为平日零星记载的簿录一类的东西是先写，积累到一定程度再编连起来。编连竹简的细绳叫做“韦”。孔子看书，看了不知有多少遍，以至细绳断过好几次，于是有了“韦编三绝”的成语。“三”是概数，非实指。人们对“韦”的传统解释是熟牛皮绳，但也有人认为“韦”应是“纬”的初字，编连的绳子犹如简书的纬线。韦，既有麻线也有丝线和绸条。策的开头，常有两枚不写字的“赘简”，对简策起着类似今天书籍封面和衬封的保护作用。有些也在第一枚的背面写篇名，第二枚的背面写书名。所以写在背面，是因为简策书写时从右向左，卷起来时从左向右即从后往前，卷好后第一、二枚的背面正好朝外。

简策是我国古籍的主要形式，而版牍主要是用于官府的文书、布告、通信、名册、地图、画图等。其中用于名录、户口登记的，叫“籍”或“簿”。

人们也把书写在织物上。这样的织物有帛、素、缙、缣等。缙是丝织品通称，缣质地细薄。帛书有时叫缙书，也叫素书。帛书的形制实际上是从简策演变来的。帛书上有界行。这些界行，有预先织成的，也有后来画上的；红的称为朱丝栏，黑的称为乌丝栏。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有很细的朱丝栏，每行的宽度、每行的字数（有六七十个）和简相近。帛的宽度和简的长度也相近。有的分上下栏，很象简策的“韦”。分上下栏的为整幅帛，不分的为半幅帛。前者为折叠存放，后者以卷轴形式存放。帛书的内容由简策过渡而来，其计量单位是卷。因帛较长，所以一卷内可包括简策的几编，甚至一幅帛上抄几种书。

帛书流行时间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帛便于书写携带和阅读，是书写材料的一大进步。但缣帛昂贵，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作为书写材料自然不如竹木用得普

遍。即使在帛书盛行的东汉，简策依然是书籍的主要形式。简策可能始于商代后期，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停止，流行了 1600 多年。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简册没有被后人发现过。据史书记载，人们第一次发现战国时期（公元前 481～公元前 221）竹简是在汉武帝时，鲁恭王在曲阜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论语》、《礼记》、《孝经》和《尚书》的竹简，因与当时传本不同，被称为“古文经”，引发了一场长期的经书古今文的争论。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卫辉市）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也有说是安厘王墓），得竹简几十车，75 篇，10 多万字。

近代从本世纪初至解放前有七次发现，地址均在西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发现，地区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沿海。这些简书的制做时代为战国至秦汉。除儒家经籍外，包括《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繚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先秦古书，也有诏书、律令和医方著作。

书籍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殷商时代，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国王事无大小都要请示鬼神，预测祸福吉凶。巫和史这两种专职人员是鬼神的代言人。巫以歌舞娱神，史掌文字记录。迷信气氛下产生的是甲骨卜辞。当然，巫史对歌舞和散文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武王克商，建立西周。西周虽也敬天事神，但更重人事，《易象》作为卜筮之书，《春秋》作为历史记录，既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前代知识的总结。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诗》三百篇和《尚书》中的《周书》代表了周代诗歌和散文的水平，是周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殷商乃至更早时代的上古先民们已有文学创作，但它们毕竟主要是口头创作。诗歌和散文在周代开始走向繁荣，必然要求

有新的文字载体。简策的出现正是适应了典章制度和文学创作的需要。同历史上任何新的发明创造一样，人类需要是其内在动力。除了人类需要之外，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条件是其产生的基础。在这个时候，黄河、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已有长足的进步，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其他手工业的进步尤其铁制造业的进步也很明显。铁器的使用，简直是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人类改造社会的手段和能力发生了重大飞跃。正是生产力的提高使简策的制做成为可能，笔墨的广泛使用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这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奴隶社会的崩溃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要求对世间一切事物进行再认识，于是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儒、道、墨、法诸家学派。各学派主张不同，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各学派的学说都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许多学者和政治家奔走于诸侯各国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有许多统治者把这些称为“士”的人延揽于自己门下。不少学者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古代“以吏为师”，教育是官方的；到了这时，教育从官方走向民间。孔子、荀子、孟子、墨子都是杰出的代表。征战杀伐，产生了孙臆、孙子那样的军事家；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屈原那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著作，全赖简策和帛书得以保存和传播，惠及千秋万代。简策帛书尤其是简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之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从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然而，简策毕竟太笨重。据说秦始皇阅读奏章，每天看的東西有几百斤重。简策的制做也不便捷。终于在东汉时，人们找到了简的代用品——纸。虽然简策和帛书与纸写的书并行

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最后终于完全被后者取代了。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据考古发现，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纸”——它们还是原始形态的纸，含有比较粗糙的纤维。经过长期的发展，东汉时的蔡伦(?~121)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终于生产出了质量好的植物纤维纸。范晔《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造纸的原料是树皮、破布和鱼网。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身为朝廷官吏尚方令的蔡伦将造纸术报告给皇帝。在官方的推动下，造纸技术逐渐普及。纸的发明和推广使用是文化史上的一场革命。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书籍形式逐渐由简策、帛书过渡到以纸为载体的写本书。在过渡时期内，简策、帛书和写本书三者并行。东晋末，纸书被普遍采用。

纸在东汉时开始用于书写，但起初地位不高。富人和权贵们的心目中，纸书不如帛书贵重。甚至到了三国时仍然如此。魏文帝曹丕把自己的著作《典论》送给吴主孙权和孙权的大臣张昭。送给孙权的是“素书”，送给张昭的为纸抄。等级有差，材料也就有别。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纸的质量不断提高，纸作为书写材料的优越性逐渐被人们认识。至两晋南北朝，纸张终于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代替了简策帛书。西晋文学家左思(约250~约305)构思十年，写成不朽名作《三都赋》，为时人推崇。“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魏晋至隋唐是写本书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组织的修书活动还是私人著述，一般都是用笔在纸上抄写，甚至出现

了专门抄书的职业。到隋唐，写本书进入了全盛时期。隋炀帝在洛阳曾令人抄书八九万卷。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射着灿烂光辉的唐代诗歌因为有了写本书而得以广泛流传。书籍的种类和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仅隋代的官府藏书就曾达到 37 万卷。人们熟知的大法师玄奘，19 年坚持不懈，译出佛教经、律、论 74 部，1335 卷，计 1300 多万字。他的译著当然也是写本书。工程之浩大，远非简帛书时代著作家所能想像。写本书时期，书籍的生产规模迅速地扩大了。

卷轴装是写本书的主要形式，因此通常又把写本书称为卷子。

卷轴装是从帛书发展而来。卷子的纸就是由一张张纸粘成的长幅，形状类似帛。它的轴有普通竹木，也有紫檀、琉璃、象牙等名贵材料制成。用什么材料做轴，要由书的价值决定。轴长大于幅宽，两头伸出卷外。轴在卷末，也即卷的左端，卷入卷内。轴头外端有象牙、骨头、玉片等材料制成的“签”。签上注明书名和卷次。不同颜色的签表示经史子集不同种类。书在架上平放。签的作用是便于识别。为防止露在外边的卷首污损，人们在卷首再粘接一层纸或用丝织品裱糊，这称之为“标”、“玉池”，俗称“包头”。包头外沿中间有一条丝带，称之为“带”，用来捆扎卷子。一部书如果有许多卷，就要用织物包在一起，此称之为“帙”。近代在甘肃敦煌千佛洞中发现的古写本书几乎都是卷子形式。

一卷书如果太长，展开时极不方便，尤其是查字典韵书中的某字某韵十分麻烦。唐代后期即公元 9 世纪，人们将卷子加以改进，把纸卷一正一反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前后连起来包上书皮。原先的一卷书变成了一册书。这样，翻阅起来就可以很快找到要看的內容。即使从头到尾找一遍也快如旋风，于是

人们称这种书为“旋风叶”、“旋风装”、“旋风册子”，简称“叶”、“叶子”。它类似于古印度传过来的佛经“贝叶经”——一种刻写在树叶上的书，因此又称“梵筴”或“经折”。近年来也有人认为“旋风叶”就是“龙鳞装”，即在舒展开的卷子底纸上，书页依次象鱼鳞一样粘贴，收卷时，书页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

旋风装、经折装和鱼鳞装，都是书籍由卷子向册叶书过渡时期的产物。

印刷术问世后，印本书逐渐取代了写本书。然而，直到明清两代，写本书仍占有重要地位，被广泛制作和使用。明代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都是写本。在印刷技术已经十分发达的今天，也仍有一些人乐于抄书，甚至全部抄写《三国演义》、《红楼梦》那样的大部头名著和著名当代政治家的著作。现在的这类写本更多地是具有艺术价值。手稿也是写本书，更多地具有文物价值。它们都是收藏家追逐的目标。

2. 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是人类传播知识和文化的重要手段，对世界文明发展有着伟大的意义，马克思称印刷术为“文明之母”。

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现在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不迟于隋唐，较多的人认为是在唐代，又分为初唐说和中晚唐说。现存年代较早的有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塔发现的《无拓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它是公元704~751年，即唐长安四年至天宝十年间的印刷品。有学者认为这卷经书是唐代长安印本，不是新罗自己刻印的；1944年4月发现于四川成都墓葬的《陀罗尼经咒》，印刷时间约在757~850年间。以上两书的印刷年代都是推断。现存有明确刻印日期的是《金剛般若

若波罗密经》，简称《金刚经》，1899 年发现于敦煌。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咸通九年是公元 868 年。该书为木刻本。卷首的释迦牟尼说法图，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版画。图和文字都印刷精美，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假如没有印刷术长时间的发展，刊刻技术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可惜该书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雕版印刷的发明，无疑受到了古代印章和拓石的影响。拓石是将石刻文字转印到纸上成为拓片。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刷上墨印在纸上。刻好一次版，可以反复印刷多次，制成大量复本。用单一的颜色如黑色或红色印刷，称为单印。雕版印刷术问世后，出现了许多精品，如宋代的《三礼图》、《证类本草》，金代的《赵城藏》、《大观本草》，明代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

元代，又创造了在一张纸上印几种色彩的套版（又称套印）方法。用红黑两色套印的叫朱墨本，用三种颜色套印的叫三色本。此外还有四色本、五色本等。现存最早的套印绘画是 1974 年在山西应县发现的辽代《南无释迦牟尼佛像》，印于辽统和年间（983～1011）。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书是 1941 年在湖北江陵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解》，刻于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书中的图和经注皆用朱墨两色套印。到明代万历年间，套色印刷已十分流行。如吴兴闵氏刻了三色本的《孟子》、《战国策》和四色本的《国语》、《文心雕龙》。

唐代后期的雕版书，仍通行卷轴书的形式，到“旋风叶”时仍如此。书籍演变为“蝴蝶装”，每叶单独雕版，特有的雕版形式才固定下来。把每个单叶装订成册而成书，称为册叶制度。这种印刷书籍的形式为今日世界所通用。

中国古籍中的册叶书,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无论是蝴蝶装、包背装还是线装,都是一叶一叶即每页双面折叠而成。每一印页的格式称为版式。每叶纸纸面上印版占据的地方叫“版面”或“匡郭”。版面之外,上下分别叫“天头”、“地脚”、左右两侧称为“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版框上下距离称为“高”,左右之间为“宽”。构成版框的粗线称为“边栏”,据所在位置分称“上栏、下栏、左右栏”。一条线的边栏叫“单边”或“单栏”。粗线内侧若再加一细线,则为“双边”或“双栏”。一般图书有四周双边、单边和两侧双边几种形式。也有的图书用“花边”形式。版面用竖线分成若干行。这称为“界行”或“边准”。有不分界行的叫“白文”。一叶书或半叶书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都要注明。“几行几字”的说明叫“行格”。版面中间的一行不刻正文,称为“版心”或“中缝”。中缝印有象鱼尾的图形,称为“鱼尾”。鱼尾将中缝分为几部分,写上书名、卷次、叶数、刊刻出版者姓名等。鱼尾有多种图样。鱼尾至上下版框间的部分叫象鼻。象鼻中印有黑线的叫黑口,这条线如果较粗形成黑牌,就称为大黑口,如果较细,称为小黑口;刻有文字的叫花口,又称口题;没有黑线和文字的叫白口。鱼尾的叉开点和版心中央的黑线是书叶的对折线标志。另外,有些书籍版框两边栏外的上方有一个小方格,称为书耳、耳子、耳格,简称耳,多印上书的篇名。其作用相当于现代铅印书竖排本的中缝和横排本的书眉,便于人们翻检。

说到雕版印刷尤其是套版印刷,不能不提到短版印刷。短版是指用大小不同的雕版分色逐次套印拼成一整版。因为是分版分色套印,所以成品中有多少种颜色就要雕多少版,每种颜色因淡浓不同又要刻不少版。这样,印一幅画有时需要几十块大小不一的版。“短版”两字与“短钉”(也作“斗钉”)有关。斗

钉是一种五色小饼，做成花卉禽兽珍宝的图形，摆放在食盒中。分色套印，犹如五色小饼的拼凑堆砌，起名为“锭版”真是十分贴切的比喻。有些图画如行云流水，用凸凹两版嵌合压印，使花纹突出、纸面拱起而形成立体感，这称之为“拱花”。锭版和拱花印刷发端于明末。明末崇祯年间(1627~1644)徽州人胡正言锭版印制了《十竹斋画谱》，又将锭版与拱花技术结合，印制成《十竹斋笺谱》。清康熙四十年(1701)刻印的《芥子园画谱》也是锭版印制。

今天的木刻水印技术就是锭版拱花技术，只是改变了一个名称。名闻遐迩的北京荣宝斋将木刻水印技术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荣宝斋的木刻水印完全用手工操作。它不是对原作的简单复制。先将透明不透水的胶纸放在原作上勾描成图稿；再将半透明薄纸放在图稿上，对照原作的颜色和颜色浓淡层次，分描成许多图稿，刻成许多木版。套印时，必须懂得原作者的用笔先后顺序。不仅要掌握很高的印刷技术，还要有一定的艺术功力。荣宝斋印制南唐顾闳中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时，刻制印版 1600 多块，8 年时间印成 30 多幅。木刻水印制品酷似原作，几可乱真，是有很高收藏价值的珍品。

雕版版片上的字，是人手写而后摹刻的。欧阳询体、颜真卿体、柳公权体和赵孟頫体都曾为刻书所用的字体，皆属楷书范围。用楷体字写版的刻本称为写刻本，从宋一直流行到明初。在宋版书中有一种整齐方正的字形，大概是书工所写，被后人称为“宋匠体”。明正德、嘉靖年间有仿宋浙刻欧体字刻本，刻书字体逐渐向方体字过渡。万历年间，刻工改造嘉靖仿宋字体，横轻竖重，称为“明匠体”，又称“宋体”，清代成为刻书业普遍采用的字体。康熙十二年(1673)规定：“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体字，楷书均称软字。”软字，就是今天的正楷书。宋

体和正楷被固定下来，沿用至今。宋体今称“老宋体”。

前边说到的蝴蝶装，又称蝶装，书页展开恰似蝴蝶。此种册叶形式在宋辽时期盛行于我国南北各地。至元代有些书籍还用这种形式。因为古代纸张都是单面印刷，有一面是没有文字的，所以蝴蝶装书籍给人一个极大的不便，看完两页文字后就要遇到两个白页。

粗略看去，蝴蝶装的外观形式与今天的图书已无太大差别，但也略有不同。首先，它不是装订起来而是粘连在一起的。粘连的位置在版心。粘连在一起的部分叫书脊、书背或书脑，相对的另一部分叫书口。书的上端叫书首，下端叫书根。有的书在书根上有书名和卷次，排在书架上书背朝上，书根向外，查找起来极为方便。这种装法的书，其封面一般用较厚的纸印成，有些还裱上绫罗等材料，俨然类似今天的豪华精装本。

渐渐地，包背装代替了蝴蝶装。包背装与蝴蝶装一样，也是把每叶粘贴在书背上。所不同的是包背装版心向外，省却了看两页书就有两张白页的麻烦。放在书架上时，为了保护版心免遭磨损，就不能再书口向下了，而只能采取平放形式。既然是平放，封面就不一定用硬质材料，可以采取软面。这可以看作是今天简装书的早期形式。

将书页一张张地粘连在书背上，是件很麻烦的事情；要粘连得整齐，还需要有精细娴熟的手工技术。粘连处也容易脱落。于是人们在书脑处穿孔，再用纸捻订牢。包背书开始向线装书形式过渡。到明朝中叶，出现了线装书。线装书不再是用纸捻而是用丝线缝钉。丝线的颜色以白色和米黄色为佳。多用双线。有时也用浅蓝、浅黄或棕色的绫包装上下两个书角，叫包角。一般采用四眼钉法。开本大些或较厚的书也有用六针眼乃至八针眼的。

人们为了保护书籍，方便使用，常常配以硬纸匣将书包装起来，它们被称为书套、书函或书壳。书套一般是用硬纸衬里，外面用蓝布裱糊。较考究一些的则用锦将书的四边包起，用两枚骨签插紧，只空出书根和书首。更讲究一些的则将书根书首也包起来，叫四合套。为了使函套更有艺术性，有的在包书根、书首的两块相接处挖成云纹镶嵌，称之为云字套。也有些书籍是用两块大小一样、上下两端各穿一根带子的木板（夹板）夹住扎牢。珍贵书籍常被用精致的木匣、小木箱装起来，匣面、箱面刻上书名、版本和册数。比如二十四史之各史用小木箱装起来，箱面刻上“史记”、“汉书”等字样，这些箱子可任意组合摆放，能给家庭增加浓厚的文化氛围和雅趣。

我们现在说的古籍版本，实际上是专指雕版的惯称。雕版书从北宋盛行起来后，全国各地刻书成风，大大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自宋至清，刻书有官刻、私刻（家刻）、坊刻和书院刻书四种。

所谓官刻书，就是政府机构组织的刻书。宋代，中央的刻书机构有国子监等，地方上有各地公使库、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以及郡、府学和书院。元初官刻，中央由兴文署主办，地方由各处书院掌管。明代，朱元璋定都金陵，立即成立国子监收缴各地书板修残补缺。因明成祖迁都北京，另立国子监，故明代国子监刻书有北监、南监之说。明代官刻有内府和各直省两类。内府所刻书称为经厂本。苏州、徽州、金陵、吴兴、新安的官刻书都很著名。清代前期官刻图书机构众多，遍布全国，有中央政府的部院监司、地方的州府县学和书院。清代官刻图书机构中，最为有名的是直属内府的刻书机构武英殿修书处。它设置于康熙十二年（1673），机构庞大，官员众多。康熙一朝的内府刻书，校勘精良，字体秀丽，将极高的书法艺术和雕刻